

经济发展研究

(上卷)

董辅初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89521

经济发展研究

(上 卷)

董辅初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摄于1997年元月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议会论坛第五届年会



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代表法国政府授予董辅弼军官级学术勋章
1988年5月26日在法国驻华使馆



1996年7月全家摄于美国洛杉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研究/董辅初 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3

ISBN 7-5058-1085-5

I. 经… II. 董…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432 号

前 言

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我国当前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两大课题。经济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革除桎梏经济发展的制度,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而在改革进程中,经济发展也应为经济改革创造必要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经济发展最终检验着经济改革的目标、方式和措施的恰当与否。开放则既有改革也有发展的内容。

1979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两个方面都遇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人去思考,去研究。而这两大课题也成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课题。在经济改革方面,我的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已编入《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一书(二卷本)于1994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也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经济发展研究》则收集的是这段时期我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写的一些文章。在此之前,即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我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书——《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内容仅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和中外经济发展问题比较,其他方面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章没有收入,即使上述三个方面的文章也仅收入了一部分。该书早已售罄,本

拟再版,但纸型已不复存在。在编辑目前这部书时,为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状况,经济科学出版社建议,将《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的文章也包括进去。这样,除了我为香港《华南经济新闻》所写的文章中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已编入另外两本书——《论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华南经济新闻出版有限公司、中华工商出版社,1995年香港版、大陆版)和《中国经济纵横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外,我在这段时期所写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章,大部分已收入这部书内。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我在经济发展问题方面的基本见解,我就本书中的文章内容作一点简单的说明。

关于经济发展理论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外形成了一门发展经济学,而且出现了众多的学派。由于长时间与世界隔绝,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国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状况是不了解的。这当然不是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过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理论,那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主臬的一种经济发展理论。虽然以后我们对苏联的这种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已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仍未从根本上跳出其窠臼,对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律排斥,而且也不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理论上的封锁和故步自封的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1980年,我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

代表团的一员访问美国，并参加了高层次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1986年我又参加庆祝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成立25周年的盛会，讨论“发展经济学的状况：进展与前景”。同时，我也有机会到各国访问、出席各种会议，使我对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有了一些了解，从而激发了我对以往我国奉行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重新思考，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战略和问题》是我为参加上述耶鲁大学的庆祝会而写的，载入会后的文集中。此文在国内未曾发表过。文中我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遵循的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等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应该说，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是最有条件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对一些研究生谈过：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深深地感到，我们生活在这块最肥沃的土壤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1986年我第一次到温州一带作调查，受到巨大的震动与刺激，在我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一篇《对发展经济理论的若干思考》，就是从这次调查中悟出来的。我在此文中就五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有些

是国外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谈过的,或者谈得不多的(如传统在发展中的意义、发展的代价等),有些虽然也谈过,但结合温州等地的实践,也有一些新的见解。

鉴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曾在经济科学出版社主编过一套《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我为此丛书写了一篇序,阐明了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同时也简单地涉及我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看法。这套丛书包括了国外不同学派的发展经济学中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也有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丛书的出版受到广泛的欢迎,有些书以后还再版过。顺便还想说一下,我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为适应当代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我曾对研究所研究室的结构作了大的改组,成立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等研究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海伦·休斯教授捐赠了一百本世界发展经济学名著,并为我们免费培养了一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生(她曾向我提出愿意免费培养50多名这方面的博士生)。我也想借此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1989年以后,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应的研究室被砍掉了,送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也停止了。但我仍坚信,在我国必须大力开展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在目前这部书中,虽然专设了经济发展理论的部分,

但实际上,这样编并不很恰当,因为其他部分的许多文章也包含了经济发展的理论,专设这一部分,只不过是为了分类的方便罢了。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在我国,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者之一。如前所述,1980年我参加了“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这是我国经济学家第一次参加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和一些重要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包括几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如阿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肯尼思·阿罗、哈里斯·钱拉里、古斯塔夫·拉尼斯、海伦·休斯、依尔玛·阿德尔曼、贝拉·巴拉萨等等。会上讨论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发展战略(台湾叫“策略”)这一概念。那真是一次启迪思想的会议。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收获良多。我还于1980年参加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参加1986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上述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的启迪下,并根据我从1976年起访问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亲身感受,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文章。我在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后,即在《财贸经济》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问题》,又于1981年5月在《瞭望》上发表了《谈谈经济发展战略》一文。这可能是我国有关经济发展战略最早的文章。随后我

又写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等文。我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一本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书。《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一文就是为编写此书而写的。我曾试图以此文观点统率这本著作。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干扰,这本书只写出部分章节,未能完成。

关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很值得我们反省。事实表明,沿袭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拨乱反正,就包括了对以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和转变。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出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参照国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反思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成败,我在上述一些文章中和其他文章中,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后,我又在别的文章中概括为六个方面)。1987年我在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中法经济学家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中又对此问题从检讨“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此文未在国内发表)。我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概括和论述提出得最早,与其他人日后的概括和论述也有差异。

这里还需提到的是,在与于光远等同志参加于 1980 年夏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后,我们在墨西哥作了短暂的访问,对墨西哥的国土规划获得了深刻印象,于光远同志以其学术上的高度敏锐,从 1981 年起在国内发起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和研究,每两月讨论一次,我协助他在推动这项讨论和研究中作了一些组织工作。这项讨论和研究在国内影响巨大,日后,各产业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和研究,均发端于此。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上常常混用(在本书中有时也混用),但有时也作区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以表明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变量及其数量关系。在发展经济学中也往往把经济增长理论纳入其中,作为其一部分内容。经济增长往往被理解为经济的量的增长(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等),而经济发展则是指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经济的进步,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品质的改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环境改善等等。因此,并不是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导致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可能出现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因此,区分这两个概念是有意义的。但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使经济增长能取得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果,必须考虑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早在 60 年代初,在苏联

和我国都先后讨论过。起始于苏联的这场讨论的开展,是鉴于粗放的(或称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导致相应的经济发展,相反,还引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诸如效率和效益低下,资源的浪费和日益短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等等,从而提出要向以集约的(又称内涵的)增长为主转变。但是,这场讨论在我国和苏联均未取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际结果。其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方式取决于众多因素,特别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当未在这两方面作出根本转变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转变的。我国在1979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又重新提起。我在80年代初在论述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等文章中就多次提出过由以粗放为主的发展向以集约为为主的发展的转变的论点,把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收效甚微,以致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重新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不过在讨论此问题中,一些人对此问题产生了许多误解,有的文章更自相矛盾。这是理论混乱、概念不清造成的。而这又必定会导致行动上的失误,甚至使《建议》中的这一重要思想无法实现。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几篇文章,试图予以澄清。

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为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为此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这是异常艰巨的任务。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定要伴随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即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或城镇化)。没有这种转移,现代技术不可能在农业中运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大大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居民的生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向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靠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很多,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人口的非农化和城市化遇到了严重困难,必须突破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的常规,寻找适当的途径。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是中国的一项有深远意义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农村中的非农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束缚,在农村中发展非农产业,尤其是发展非公有的农村非农产业曾遭到强烈的非议,争论激烈。农村非农产业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关注。1980年为参加墨西哥的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我就写了一篇《中国农村工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文章,此文未曾发表。目前,当时的英译稿尚在,但中文原稿已遗失,因此未能收入此书。在此之后,我曾到郑州和苏州农村调查,1986年带了一个小组到温州、金华一带调查各地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展。这些调查给我以很大启示,我先后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文章,在温州、在北京大学等地和单位作过多次报告。我结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争论激烈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给温州等地遭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干部以积极的支持,同时解除其疑虑。其中一篇长达6万多字的文章——《中国农村改革、非农产业的发展 and 农村现代化》一文是应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之约而写的,并于其在巴黎召开的亚非国家部长级干部研讨班作过讲授。另一篇《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则是1991年6月孟加拉国总理卡莉达·齐亚夫人访华时,应孟加拉国政府的要求而写的,并为齐亚总理及其代表团一行作过一次讲解,此文未曾发表。另外还有几篇有关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文章和报告记录,因为有些内容与本书收入的文章有重复,没有收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英国,我曾与剑桥大学的彼德·罗兰博士共同编辑出版了《市场的力量:温州的争论》(1990年)一书。我自己则在英国出版了《工业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1992年)一书,作为我与罗兰共同主编的《中国经济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为了研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我曾多次去温州调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本书中有一篇《论文化与经济》的文章,也谈到从温州得到的一些启示(我在有关贝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等文章中也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从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以后,关于温州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道路问题,才没有了争

议。我为温州争辩的论点想必也不会有争议了。

关于中外经济发展的比较 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怎样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我在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时,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也很关注,因此我对访问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贫穷落后的国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有幸去过不少发展中国家,非洲去过两次,一次是应贝宁总统克雷库的邀请到贝宁去讲学的。印度也去过两次,一次是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去访问的。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访问中注意考察和了解他们的经济社会状况和问题,并与我国的情况作比较,由此常常引发出一些想法。本书中收入的一些文章,记录了我的这些想法。我对这些国家的访问时间都很短,谈不上有深入研究,但由于自己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在短期访问中也往往能悟出一些道理。例如,我在贝宁的访问中想到,那里还未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大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差异。又如,我在印度访问时,曾只身进入孟买市一望无际的贫民窟内进行了解,并获得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对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感受。我在《开展经济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十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在这些访问中想到的,至今也还值得研究。

社会福利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有关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文章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同时,我曾先后两次到英国研究英国的社会福利问题。收集在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是第一次调查时写的,我想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一些参考意义。

关于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会发生变化,反过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于产业结构问题,收入本书的文章不多。有一篇较长的文章——《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调整问题》,放在书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宏观调控”部分,是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近来也写了一些。但是,我在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文章中,对产业结构问题却谈得不少。事实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会形成怎样的产业结构。改革初期,我国对产业结构进行的调整,就是由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形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障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在最近写的几篇有关产业空洞化的文章,对于沿海某些发达地区可能是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状况,既决定于全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决定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些年来,各地都在研究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我常被邀请参加。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的变化,也常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写过的、谈过的,远远超过本书中所收集的文章和讲话。例如,我曾主持过有中外专家参加的关于厦门经济特区的经济发